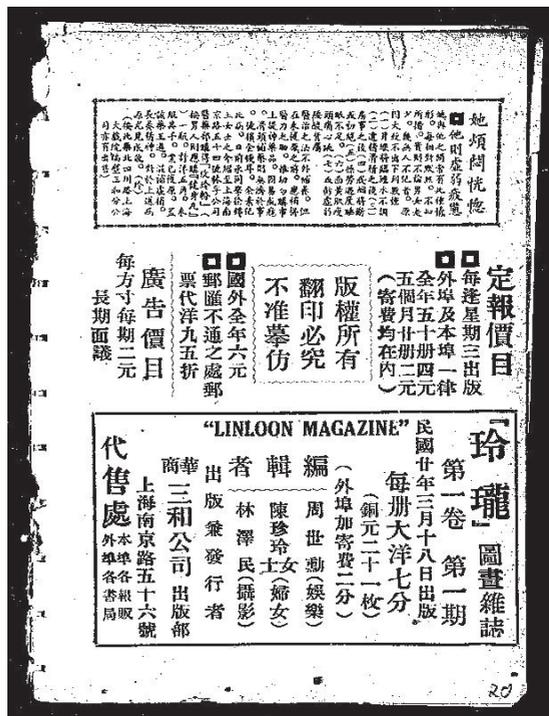


在新文化運動的思潮下，民間出版了許多女性雜誌，《玲瓏》就是一例。該雜誌在1930年代上海享譽盛名，風行一時。本文會以此為引子，述說1931年至1937年期間上海的「摩登女性」風潮與新興的女性經濟。

《玲瓏》雜誌的背景資料



《玲瓏》001期雜誌相關資料
 (圖片來源：哥倫比亞大學資料庫)

《玲瓏》是一本女性雜誌，其尺寸體積非常小，只有64開¹，小巧精美，故名「玲瓏」²。該雜誌在1931年3月18日發行創刊號001期，共連載七年，出版298冊。1932年，雜誌一度因淞滬戰爭³停刊，之後繼續辦刊⁴，後因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再度停刊，1937年8月11日為最後一期⁵。

創刊宗旨：增進婦女優美生活，提倡社會高尚娛樂⁶。

出版性質：周刊，每逢星期三更新，全年出版五十冊，每年為一卷⁷。

出版商：三和出版社，位於上海南京路56號⁸。

編輯陣容：林澤蒼、婦女版陳珍玲、常識版曹冰冷、娛樂版周世勳、攝影林澤民，後陸續加入彭兆良等人⁹。

售賣地點：上海各大報館，為便利外地讀者更提供郵寄服務¹⁰。

《玲瓏》有甚麼內容？

《玲瓏》所載大多是與女性相關的軟資訊，內容多樣化，有生活類題材，比如時尚風格、美容健身、音樂（樂譜）、電影快訊等，亦有情感、心靈類，如婚姻愛情、家庭，兩性關係；且有社會時事類、廣告購物類、活動類，如抽獎，約稿與投稿，每期必有「玲瓏消息」，解釋出版資料。

¹ 孔令芝：《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（臺北：稻鄉出版社，2011），頁18

² 同上註，頁40引《玲瓏》001期，1931年3月18日，頁34

³ 淞滬戰爭又稱「一二八事變」，是日本在1932年1月28日發動的侵略上海之戰爭

⁴ 孔令芝：《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頁18

⁵ 同上註

⁶ 同上註，頁40引《玲瓏》001期，1931年3月18日，頁13

⁷ 同上註，頁18

⁸ 《玲瓏圖書雜誌》，《玲瓏》001期，1931年3月18日，頁20

⁹ 孔令芝：《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頁36-37

¹⁰ 《玲瓏圖書雜誌》，《玲瓏》001期，頁20

《玲瓏》有何重要性？

在清代以前，社會識字率低，女性作者更是少之又少。女性即使有讀書機會，也只是學習詩詞類及《列女傳》等女學。社會由男性主導，在一眾男性所寫的作品中，我們難以了解女性的內心世界，更遑論聽到她們的真實聲音。《玲瓏》在1931年至1937年連載，並發行各地，我們可從中得悉該時期的藝術、社會及政治改變，更重要的是這是一本女性雜誌，可供女性讀者投稿及諮詢，亦有欄目收錄編者與女讀者的對話，是了解女性聲音的直接方法。

不僅如此，《玲瓏》的創立宗旨是提倡新女性概念，讓女性覺醒，對民國乃至之後的女性發展有深遠影響。張愛玲認為《玲瓏》意在「以現代歐美女性身體為參照，教導幫助女性如何從頭到腳、由內而外地成為現代摩登女性」、「鼓勵婦女通過社會的高尚娛樂來追求美好生活」¹¹。

《玲瓏》與上海摩登女郎

「摩登」是Modern的音譯，「摩登女性」的概念於1930年代開始在上海興起。女性透過反思自身、立足國權、女權等新理念，一改傳統女性為男性的附屬¹²，且禁錮在閨閣的形象¹³。《玲瓏》討論時尚服裝、消費活動到交際禮儀，推進女性的社交公開¹⁴。《玲瓏》的特點是彩色印刷封面，而封面人物幾乎都是女性，她們多為年輕貌美的名媛閨秀、學生、運動員、明星¹⁵，也有國外當紅影星及兒童模特¹⁶。封面女郎身穿現代服裝，宣傳要成為新女性就必須從外形改變。

名媛閨秀

名媛本身家境殷實，且有較高的教育水平，活躍於交際圈；她們愛表達自己，所以樂於拍攝相片，並視登上雜誌封面為榮耀¹⁷。



《玲瓏》001期封面
(圖片來源：Wikimedia Commons)

¹¹ 洪長暉、王志敏等：〈《玲瓏》雜誌廣告定位策略與女性形象建構〉，《文化與傳播》，2015年06期，頁46-50引張

¹² 愛玲：〈談女人〉，原刊於1944年3月《天地》月刊第6期，亦載於《張愛玲作品集——流言》（廣州：花城出版社，

¹³ 1997），頁70

¹⁴ 《儀禮·喪服·子夏傳》的女性三從：在家從父、出嫁從夫，夫死從子

¹⁵ 史敏：〈摩登言說中的女性存在——1930年前後中國都市現代女性的新潮〉，《黑龍江史志》，2015年01期，頁167-169

¹⁶ 同上註

孔令芝：《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頁71

《玲瓏》045期，1932年1月27日出版，封面為三十年代美國當紅影星珍妮特·安娜·麥克唐納（Jeanette MacDonald）；而088期，1933年3月22日出版，封面則為愛羣女校幼稚生臧韻芬；237期，1936年5月20日出版，封面是秀蘭·鄧波兒，她是三十年代活躍於荷里活的知名童星

¹⁷ 孔令芝：《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頁70

《玲瓏》001期創刊號的封面女郎為周淑衡，她是郵票大王周今覺的女兒¹⁸，也就是當時的名媛。封面中周女士頭梳時髦的捲髮，上身穿淡綠色短衫，單手撫心，狀似西子，下身著粉色長裙¹⁹。她直視鏡頭，神態淡定，配上誇張的菱形耳飾、珍珠項鍊和手鐲，盡顯華貴。李國綏及潘振坤亦曾登上雜誌封面²⁰，前者皮草配旗袍，以首飾點綴；後者身披白色披風，兩粒大珍珠耳飾甚是醒目。而北平名媛許麗娜，則梳捲髮，身穿無袖旗袍，雙手持花瓶，眼睛斜斜看著花瓶²¹，諸多例子不勝枚舉。

分析：

名媛生活奢華、追趕時髦，這從她們的服裝打扮可見。她們比一般女性更注重個人形象，且敢於打扮，多以誇張的珠寶和服裝剪裁凸顯身份。由於並非每個人出生都有良好的家世，故此《玲瓏》刊登名媛為封面，內頁也附上她們的經驗，為時下女性提供參考範本²²，讓每個女性都可以成就更好的自己。

女學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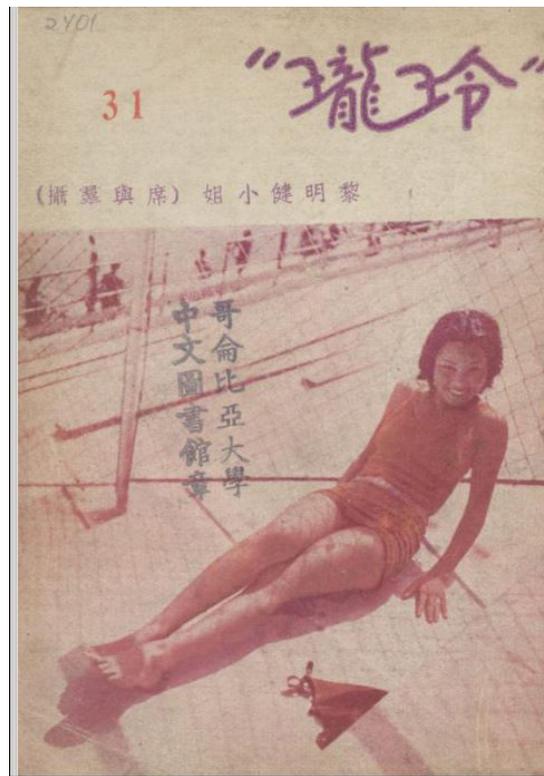
民國時期興起女性讀書的風潮，而女校的成立令社會產生一個極具影響力的新群體——女學生。她們是正受教育的花季少女，立志成為新時代女性，因此踴躍展現個人特質，投刊《玲瓏》雜誌，成為封面女郎。

002期封面為李月嫦，她是滬江大學的女性領袖，不但品學兼優，同時擅長演戲與辭令。封面中的她身穿粉紅色旗袍、捲短髮，恬靜地坐著。而第100期特別刊的封面是剛從崇德女校畢業的女學生夏志勤²³，她與李月嫦相同，側分捲髮、穿波點藍色旗袍，微笑望向鏡頭，神態自然²⁴。另外，中西女塾的學生秦昭華²⁵、南京匯文女學的謝文息²⁶及北平女子壘球第一名的周戴芬²⁷，均以女學生的身份登上《玲瓏》的封面。

分析：

為普及女性教育，民國時期新建不少女校，從而催生了龐大的女學生群體。其中以上海地區有最多女校，包括滬江大學、中西女塾、聖瑪麗亞女校、崇德女校、上海美專。其他大城市也有女校，例如北平民國大學、南京匯文女校、蘇州東吳大學、廣東體專等²⁸。

1932年，全國女學生共計106793人²⁹，而上海的女性受教育的機會較高³⁰，該地區各類學校所吸納的女生遠超其他地區，中等師範學校的男女性學生比例甚至達到了三比七³¹。學歷的提升意味著識字率的上升，而這批女性是婦女刊物最主要的讀者群體，她們的消費能力也相對較高，產生了一種獨特的女性經濟。



《玲瓏》298期封面影星黎明健
(圖片來源：哥倫比亞大學資料庫)

¹⁸ 孔令芝：《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頁70

¹⁹ 《玲瓏》001期，1931年3月18日，封面及頁2

²⁰ 《玲瓏》006期，1931年4月22日，封面：李國綏，孔令芝：《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頁72指她是李鴻章侄兒李經瀆的女兒，精通法文，又通詩詞及鋼琴；《玲瓏》007期，1931年4月29日，封面：潘振坤，畢業於中西女塾，聞名於社交界

²¹ 《玲瓏》282期，1937年4月21日，封面

²² 孔令芝：《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頁74

²³ 《玲瓏》100期，1933年6月21日，封面

²⁴ 孔令芝：《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頁72

²⁵ 《玲瓏》039期，1931年12月9日，封面

²⁶ 《玲瓏》051期，1932年5月25日，封面

²⁷ 《玲瓏》190期，1935年6月26日，封面

²⁸ 孔令芝：《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頁72

²⁹ 張學玲：〈徬徨與苦悶：家事和職業間的民國職業女性〉，《寧夏社會科學》，2019年03期引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：《中國婦女運動史》（北京：春秋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283-284；「大學生3290人、專科生559人、留學生89人、中學生69741人、師範生23738人、職業學校女生9376人」

³⁰ 洪長暉、王志敏等：〈《玲瓏》雜誌廣告定位策略與女性形象建構〉，頁46-50

³¹ 同上註

《玲瓏》封面女郎與新文化運動有甚麼關係？

《玲瓏》展示了社會不同階層的女性形象，有上層的名媛、知名影星，也有女學生代表，顯示出一連串的女性圖譜。她們或是獨自出鏡，或是群體合照，或動或靜，展現女性自信的一面³²。這一切都歸功於新文化運動，引進西方思想和女性教育，打破了封建嚴肅的氛圍，為社會注入開明且自由的空氣。由此，女性地位開始得到重視，進而爭取個人權益、享受社交生活。

《玲瓏》作為社會教化工具，提出女性解放先從改變婦女的外形開始，美容³³和服飾³⁴的改變是最為直接的。變美非僅為了取悅男性，女性也能透過裝扮展現自己的美態，建立自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女性服裝在民國時期有很大突破，《玲瓏》封面女郎多燙髮、身穿旗袍，這個配搭也是民國時期的潮流打扮。旗袍本為滿族女子的傳統服裝。清末時期的旗袍袍體寬大、腰身平直、衣長至足，遮掩人體曲線³⁵。民國時期產生改良旗袍，正如新文化運動一般新舊交替，東西融合，既保持中原女子直筒長衫的著裝習慣，又在審美、工藝方面融合了更多西方服飾元素，如墊肩、蝴蝶領、開衩，甚至是混搭西方外套³⁶。當時中國流行著用花布、條格棉布和陰丹士林布縫製的改良旗袍，這些布料色澤清雅、素淨，尤以陰丹士林布造成的旗袍最受女學生、職員甚至閨閣小姐的青睞³⁷。

改良旗袍出現的原因主要是方便女性活動。擺脫穿衣觀念的束縛，有利女性探尋自我及展現個性，是進化為新時代女性最迫切的需求³⁸。在新文化運動的思潮下，民間抗拒封建禮教的限制，同時對男女平等的要求日益強烈。民國時期女性積極參加社交、工作、學習等活動，故需要禮儀性和實用性兼備的新型服裝³⁹。

另一方面，服飾色彩含有刻板的性別意識及傳統意義。古代服飾忌諱黑、白兩種凶色，因此過節、過年、生育、婚嫁期間不能穿這兩種顏色⁴⁰。但

新文化運動破除封建的精神，令1930年代的旗袍顏色五花八門，女性可穿的顏色不限於粉紅色、大紅、大綠、金黃色等，也可選較中性的黑、月白、藍、灰等色⁴¹。可見在當時的社會整體環境下，色彩的搭配消除了傳統的刻板化性別特徵⁴²。

小結

新文化運動旨在破舊立新、引進西方思想，這兩點都能從《玲瓏》封面女郎的衣著打扮窺見。透過外在的改變，女性能夠展現自己的美態；服裝打扮的簡化，方便了女性從事工作、運動和社交，這是最基本卻又是最重要的變更。可以說，《玲瓏》是時代催生的產物，同時也反映了民間對婦女發展的關注。

《玲瓏》雜誌與民國時期的女性經濟

走出家庭的職業女性



《玲瓏》100期〈職業婦女的痛苦〉
(圖片來源：哥倫比亞大學資料庫)

³² 孔令芝：《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頁71

³³ 沈怡祥：〈現代婦女何以比從前婦女好看？〉，《玲瓏》024期，頁872：「美容術的強力效用。從前的婦人們不曉得如何化妝，而上世紀三十年代滬上的女子們則以美容為一日中必修之功課。這是在美容觀念與美容技術上的改變，此外社會還提供了專業的美容師，可以使每個人都享受專業服務。社會的進步導致女子洗澡更方便、更頻繁，這使皮膚顯得更好看，至少讓人看起來整潔。」

³⁴ 沈怡祥：〈現代婦女何以比從前婦女好看？〉，《玲瓏》025期，頁901：「(二) 服飾的進步……在最近幾年中，服飾纔有極大的進步。從前是一季祇有一種的式樣，現在可不不然了。每季總有好幾種式樣，而且一日間又晨裝晚裝運動裝跳舞裝種種。對於配色，也比從前有研究了，而且各人儘穿自己歡喜的顏色和式樣，別人絕不會說你不及時。」

³⁵ 萬程：〈從西學東漸解讀民國女性服飾與色彩設計〉，《美術教育研究》，2012年02期，頁86-88

³⁶ 包銘新等：《中國旗袍》（上海：上海文化出版社，1998），頁29-31

³⁷ 萬程：〈從西學東漸解讀民國女性服飾與色彩設計〉，頁86-88

³⁸ 同上註

³⁹ 同上註

⁴⁰ 同上註

⁴¹ 萬程：〈從西學東漸解讀民國女性服飾與色彩設計〉，頁86-88

⁴² 同上註

《玲瓏》為讀者提供傾訴心事的渠道，內容也不再局限於婚姻、家庭與兩性關係，更涉及工作和個人前途，可見對職業婦女的關注。許多職業女性會投稿談談自己的工作情況，比如第100期的〈職業婦女的痛苦〉⁴³。松子女士向編者述說自己身為職業演員的辛酸：需要應酬許多陌生人，自己因而丟失工作機會的難受⁴⁴。編者見此亦感同身受⁴⁵。這時，民國女性擁有的身份不單是刻板的女兒、妻子和母親，更有員工，而這個身份和家庭是沒有任何關係的；可以說《玲瓏》讓我們看到了1930年代女性正慢慢走出家庭。

不但如此，雜誌更專門設置欄目介紹西方禮儀，比如〈赴宴會的禮節〉⁴⁶、〈交際須知〉⁴⁷及〈握手須知〉⁴⁸等，以便女性投身職場應酬和參與社交。許多女性礙於西式禮儀繁瑣，因而對社交卻步；但《玲瓏》的出現，可以指導女性禮儀要項，讓她們可以練習應對，無形中給予女性更多向外發展的機會。這些資訊既是婦女成為職業女性所需要掌握的，從而間接鼓勵了她們學習新事物，嘗試走向社會，造就更多職業女性，兩者相輔相成。

分析

新文化運動提倡解放女性⁴⁹，因此國內主要報刊都開設專欄專門討論婦女問題，如婚姻家庭、經濟獨立、職業和倫理道德等⁵⁰。1920年代〈新女子應具的條件〉一文認為新女性應具備六個基本條件⁵¹，其中一項為女性經濟獨立。

有學者認為國民政府將婦女經濟獨立視為男女平權的方法⁵²，因此在1926年1月16日，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通過的《婦女運動決議案》提出「男女在法律上絕對平等」、「男女職業平等」等一系列議案，更指出政府應該鼓勵各職業及行政機關容納女子職員⁵³。法案通過之後，

國民政府便向摩登女性敞開了中央機關的就業大門⁵⁴。除了於政府部門工作，婦女從1920年代開始多從事打字、速記、編輯、郵務、圖書管理、接線、秘書等職業⁵⁵。

民國時期女性外出工作，經濟獨立後演變為消費群組，市場亦因此推出與女性相關或者以女性為主的產品，編者稱此現象為「民國時期的女性經濟」。由此，1920至30年代女性讀物湧現，除了《玲瓏》，亦有《東方雜誌》、《良友》畫報等幾十本刊物⁵⁶。

《玲瓏》的風行程度與女性消費力

《玲瓏》發行七年，共計出版298冊，期間頁數增加、售價及廣告費均呈上升趨勢。這可反映出雜誌當年的風行程度；而即使不斷加價，女性也對雜誌趨之若鶩，可見民國時期女性的消費力不容小覷。

頁數增加

雖然《玲瓏》每期頁數不定，有些期數為30餘頁，但有些期數則可達70餘頁。例如001期的創刊號只有35頁，而100期為特別刊物，則增加至79頁；最後一期第298期共74頁。由上述資料可見，在《玲瓏》發行期間，其頁數由最初發展至中後期上升了一倍有餘，內容也越加豐富。

售價上升

在連載的七年期間，《玲瓏》售價不斷上升。例如001期每期售七分大洋（21枚銅元），國內全年訂閱價四元，國外全年六元；訂閱五個月二十冊，所資兩元正⁵⁷。到了第100期，雜誌依然維持一年五十冊訂閱價四元，但是每冊的售價則升至一角大洋⁵⁸；原本的五個月訂閱也綁定至半年，訂閱價也加了半毛⁵⁹；至於國外訂購全年價格則上升至七元⁶⁰。此外，《玲瓏》提出更具彈性的訂閱方案，讀者可以訂閱兩個月，收費一元⁶¹。最後的298期，儘管半年及兩個月的訂閱價與第100期相同，但每期售價則飆升至法幣一角⁶²、全年訂閱價已經上漲到五元；而國外訂閱更需要另加郵費二元半，半年郵費則為一元三角⁶³。

⁴³ 《玲瓏》100期，1933年6月21日，頁978

⁴⁴ (廣州) 李蕙芳：〈女子職業發展遲緩之原因〉，《玲瓏》116期，1933年10月17日，頁1927-1933

⁴⁵ 同上註

⁴⁶ 茉莉〈赴宴會的禮節〉，分載於《玲瓏》004期，1931年4月8日，頁126-127；《玲瓏》005期，1931年4月15日，頁160；《玲瓏》006期，1931年4月22日，頁197

⁴⁷ 李子超：〈交際須知〉，《玲瓏》007期，1931年4月29日，頁232

⁴⁸ 呂璋：〈握手須知〉，《玲瓏》049期，1932年5月11日，頁2002

⁴⁹ 可參考佩方：〈新女性的兩大訓練〉，《玲瓏》076期，1932年11月30日出版，頁1203-1204；許嫻貞：〈新女子的責任〉，《玲瓏》175期，1935年3月30日出版，頁519-521及〈在國勢危殆中新女性應該怎樣〉，《玲瓏》260期，1936年11月4日，頁3328-3330等篇章

⁵⁰ 張學玲：〈徬徨與苦悶：家事和職業間的民國職業女性〉，頁171-177。篇中指出李大釗、陳獨秀、胡適紛紛在《婦女雜誌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婦女周刊》等雜誌上發表文章，號召婦女投身工作

⁵¹ 李永東：〈20世紀30年代中國電影的新女性形象建構〉，《藝術百家》，2011年06期，頁146-150引喬治：〈新女子應具的條件〉，《婦女雜誌》，1927年第13卷第2號，頁6-10指出（一）精神解放；（二）實事論事，有務實的態度；（三）確立求學宗旨，學習實用的科學知識；（四）犧牲精神，為解放其他婦女貢獻自己的力量；（五）無高傲態，高傲態度不利於婦女解放運動的開展及（六）女性應經濟獨立

⁵² 金石音：〈請問拒用女職員者〉，《婦女共鳴》，1931年第44期，頁21-27，轉引自史敏：〈摩登言說中的女性存在——1930年前後中國都市現代女性的新潮〉，頁167-169

⁵³ 榮孟源：《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》（上冊）（北京：光明日報出版社，1985），頁139，轉引自張學玲：〈徬徨與苦悶：家事和職業間的民國職業女性〉，頁171-177

⁵⁴ 熙宇：〈女職員之任用與婦女解放〉，《婦女共鳴》，1931年第49期，頁20-24，轉引自史敏：〈摩登言說中的女性存在——1930年前後中國都市現代女性的新潮〉，頁167-169

⁵⁵ 張學玲：〈徬徨與苦悶：家事和職業間的民國職業女性〉，頁171-177

⁵⁶ 孔令芝：〈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〉，頁64-65

⁵⁷ 《玲瓏》第001期，1931年3月18日，頁20

⁵⁸ 《玲瓏》100期，1933年6月21日，頁987

⁵⁹ 同上註，頁968

⁶⁰ 同上註

⁶¹ 同上註

⁶² 《玲瓏》298期，1937年8月11日，頁2404

⁶³ 同上註

廣告收費加價

除了雜誌銷售的收益，廣告收益也是《玲瓏》的經費來源。廣告收費是按刊登期數和尺寸而定，在最早的001期，廣告價目是每方寸每期二元；若長期刊登，價格還可以商量⁶⁴。到了第100期，刊登廣告的收費方案是全版每期二十四元、半版十二元、四分一版六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國貨在此時期刊登廣告是有特別優惠的⁶⁵，但《玲瓏》中並無細說具體內容。而298期的廣告費用與第100期相同⁶⁶，反映雜誌的廣告收費系統已經成熟。

有學者認為1930年代發行的雜誌，不僅是傳播西學、啟迪民智、政社合一的工具，更為出版商提供了實際的經濟回報⁶⁷。撇除《玲瓏》雜誌來自銷售的基本收益，女性讀者會在看雜誌的時候得悉廣告宣傳產品的資訊，若有興趣便可根據廣告的介紹購買，為三和公司帶來許多經濟收益。由於女性帶來的經濟效應難以估計，而《玲瓏》雜誌深受女性歡迎，故此許多商家便在雜誌刊登廣告宣傳產品。比如第100期中便有緒綸綢緞大同行的夏衣大減價廣告⁶⁸，以及中國化學工業社的白玉牙膏⁶⁹、利華肥皂有限公司的肥皂⁷⁰、ABC國貨的雨衣⁷¹、五洲大藥房的滋陰養顏藥物——月月紅女界寶⁷²等女性生活用品的宣傳。另由於《玲瓏》的出版商三和公司主要經營進出口代理⁷³，故雜誌亦因此有大量與《玲瓏》掛鉤的商品宣傳，例如「玲瓏乒乓球」⁷⁴、代理的各種藥物及代售的美玲唇膏等實用品⁷⁵，甚至還代客購買及修理攝影器材⁷⁶。

分析：

上文指出在1931至1937年間，《玲瓏》的頁數增加、售價及廣告費均呈上升趨勢。雖然沒有雜誌的準確銷售量⁷⁷，但當時上海女學生基本上每人一本⁷⁸；而《玲瓏》的售賣地點除了上海本地，還遍布中國各地，例如北平、天津、漢口、蘇州、南京、廈門、汕頭、長沙、四川，甚至遠及香港、小呂宋及新加坡等⁷⁹。由此可見，《玲瓏》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風靡全中國的女性讀物，其對女性的形象塑造有很深遠的影響。

從《玲瓏》的銷售情況來看，發行七年期間，售價有加無減，但坊間依然有大批支持者。據調查，上海在1930年代已形成商業消費空間，圍繞靜安寺路、同孚路、霞飛路等為中心的購物圈，有27家百貨商店、49家首飾店、7家美容院⁸⁰。種種跡象均顯示民國時期女性已有一定的經濟收入，有些甚至已能達致經濟獨立。

總結

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婦女的現代化有舉足輕重的推進力。從1930年代發行的《玲瓏》雜誌，我們可見女性在服裝造型和身份角色的改變。上海這個大都市新興大批摩登女性，她們接受高等教育、投身工作，形成獨特的經濟力量。然而，《玲瓏》作為一本婦女雜誌，所述的觀點是理想化的，當時的職業女性仍在家庭與工作中掙扎，承受社會偏見、職場受挫，社會仍存有嚴重的男女不平等⁸¹。

⁶⁴ 《玲瓏》第001期，1931年3月18日，頁20

⁶⁵ 《玲瓏》100期，1933年6月21日，頁969

⁶⁶ 《玲瓏》298期，1937年8月11日，頁2404

⁶⁷ 孔令芝：《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頁28

⁶⁸ 《玲瓏》100期，1933年6月21日，頁945

⁶⁹ 同上註，頁959

⁷⁰ 同上註，頁1001

⁷¹ 同上註，頁986

⁷² 同上註，頁965

⁷³ 孔令芝：《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頁23

⁷⁴ 《玲瓏》025期，1931年9月2日，頁919

⁷⁵ 《玲瓏》283期，1937年4月28日，頁1273及孫麗瑩：〈從《攝影畫報》到《玲瓏》：期刊出版與三和公司的經營策略〉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4），第23期，頁163

⁷⁶ 孔令芝：《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頁22-23

⁷⁷ 同上註，頁32

⁷⁸ 同上註，頁4

⁷⁹ 同上註，頁29

⁸⁰ 洪長暉、王志敏等：〈《玲瓏》雜誌廣告定位策略與女性形象建構〉，頁46-50

⁸¹ （廣州）李蕙芳：〈女子職業發展遲緩之原因〉，《玲瓏》116期，1933年10月17日，頁1927-1933指出女性職業的暫時性、工作躍升難、工資微薄、需要兼顧家庭等因素影響了女性工作的動力；而社會對職業女性也有不少輿論，例如女子工作剝奪了男性生計、影響婚姻、對男女職場不公平的合理化